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渝历史沿革/蓝勇、曾小勇、杨光华、李世平编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

(巴渝文化丛书/李书敏、蓝锡麟主编)

ISBN 7-5366-6523-7

I.巴... II.①李... III.①重庆市—地方史—石器时代~民国 IV.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3573号

巴渝文化丛书

巴渝历史沿革

蓝勇 曾小勇 杨光华 李世平 编著

责任编辑 曾海龙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4千 插页 2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6523-7/K·338

定价:14.00元

《巴渝文化丛书》序

李书敏 蓝锡麟

重庆出版社组织编纂的《巴渝文化丛书》,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持运作的“四加一”工程重点图书之一。它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分工撰写,力求大视野、多维度、广层面地系统展示巴渝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具有学理价值,而且有助于增进各方面人士对于巴渝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的切实的了解,对于塑造重庆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巴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连接带,自古与西之蜀、东之楚交融密切,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降,巴与蜀比巴与楚联系趋紧,人们多习惯于将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其共性看,自然有道理,但并不意味着巴渝缺乏个性。无论从祖系渊源、政区嬗替看,还是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看,二者都既有大同,又有殊异。早在东晋年间,蜀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巴志》,便揭示了“江州(今重庆主城区)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今重庆合川市)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巴与蜀同属四川,是从北宋咸平四年

(1001)设置川峡四路开始的,并非自古而然。因此,正如长江下游的吴越畛域可以合而论吴越文化,分而论吴文化、越文化一样,长江上游的巴蜀畛域亦可以合而论巴蜀文化,分而论巴文化、蜀文化;在巴与楚交接地带,还可以论巴楚文化(荆巴文化)或大三峡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时空内,对于地域文化进行不同层级的梳理和抉罗,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便于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事实上,前人关注巴渝文化,至少比四川建制早千余年。先于《华阳国志》,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已经述及“巴俞宋蔡,淮南于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注说:“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尔后的《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和《隋书·音乐志》都对巴渝舞作过描述。降及唐、宋、元、明、清,历代的骚人墨客歌咏巴渝不绝如缕,足见决非标新立异,另立门户。但由于巴渝地区历代行政隶属关系更迭偏剧,重庆主城直至南宋中期才由单一的行政、军事职能向着兼容的经济、社会职能转化;“多劲勇,少文学”的风习长期存在,巴渝文化固有的丰富内涵多被埋没,鲜为人知。还有一些成为耳食口传之说,难免产生误读、误导。在重庆直辖前的若干年内,四川省和重庆市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力图更张,搜罗古籍,考证文物,对巴渝文化开展分门别类的研究,渐次超越前人,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一套丛书,就是要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有所承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历史是一种过程,文化也是一种过程,其间充满了变动,回溯性研究必须截取相对的静态。这一套丛书所指的巴渝地区,概以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为准。个别涉及与此不尽一致的地界,作个例处理,随文交代明白。所涉时间上自远古,下迄当今,个别也可以迄于近、现代之交。第一辑的十本书,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

神话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等角度,述说了巴渝历史沿革、文物古迹、山水名胜、民俗风情、诗词歌赋、戏剧乐舞、神话传说、巴渝古镇、掌故集锦和英杰名流。所涉人物除《巴渝诗词歌赋》略有例外而外,均重在巴渝儿女——一指巴渝本土人士,二指尽管出生地不在巴渝地区,但一生中主要经历和人生归宿却在巴渝地区的历代人杰。述说一律以时序为经,以地方、类别、事件、人物为纬,标写时间、地点,均按学界通例。其中诗词歌赋、戏剧乐舞两本书,在重庆市这样专题述说还是第一次;其余的八本书,先前虽有相关题材的专著,但取材之新之富,立言之允之洽,无不体现各有其追求。纵或其间还有敝于一孔一得处,对相关话题,总能提供一种观照。

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便在《初民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复合整体”。据其审视巴渝文化,很显然,只凭一套丛书绝然不能解读它的所有的奥秘。而研究巴渝文化,乃是弘扬巴渝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那是一个宏大的、浩繁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多方合力,相与建功。这一套丛书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借此更希望,后续之作、跨越之作、鼎定之作次第产生。

2003年2月23日

目 录

《巴渝文化丛书》序	李书敏 蓝锡麟 轶
一 石器时代的巴渝文化与社会	
(一) 巴渝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活动遗迹 ...	/ 员
(二) 新石器文化与农业文明	/ 猿
员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轶
圆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	轶
猿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族属	/ 苑
二 巴人的历史与传说	
(一) 关于巴人的传说	/ 怨
(二) 巴人的起源	/ 员
(三) 巴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 员
(四) 巴人的经济生活	/ 员
(五) 巴人的去向	/ 员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巴渝地区历史	

- (一) 政治统治和行政区划的演变 / 圆猿
- (二) 社会经济由发展到衰退的变迁 / 猿怨
- 四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巴渝地区
- (一) 政治局势的演变 / 缘猿
- (二) 行政区划的变革 / 远猿
- (三) 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 远怨
- (四) 南宋巴渝军民的抗蒙斗争 / 愿原
- 五 元明清时期巴渝地区历史
- (一) 元代巴渝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 怨猿
- (二) 明代巴渝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 怨远
- 圆巴渝地区的行政区划与民族发展 辕远
- 圆巴渝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辕园
- 猿巴渝地区的文化发展 辕怨
- (三) 清代前期巴渝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 / 员园
- 员明清之际的巴渝地区 辕园
- 圆清代前期巴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辕缘
- 猿清代前期巴渝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发展 ... 辕远
- 六 从开埠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巴渝社会
- (一) 重庆开埠与巴渝社会的变迁 / 员园
- 员重庆开埠 辕园
- 圆重庆开埠对巴渝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辕园
- (二) 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重庆教案 / 员怨
- 员基督教的进入及其民教冲突的发生 辕园
- 圆近代重庆的著名教案 辕源
- (三) 维新改良思潮与重庆辛亥革命 / 员源
- 员维新改良思潮与近代重庆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辕源

重庆辛亥革命	猿怨
七 民国时期的巴渝社会	
(一) 军阀统治时期的巴渝社会	猿苑
巴渝地区军阀统治的形成及其演变	猿苑
军阀统治的社会特点与社会问题	猿园
重庆建市与市政建设	猿园
“五四”时期的重庆新文化运动	猿怨
军阀统治时期巴渝地区的革命运动	猿缘
国民政府统一川政, 军阀统治的结束 ...	猿园
(二) 抗战时期的巴渝社会	猿愿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猿愿
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发展	猿园
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教育发展	猿员
抗战结束与重庆地位的变化	猿愿



石器时代的 巴渝文化与社会

巴 渝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祖先的遗迹，有了上百万年的人类遗存与文化。迄今为止，就中国所发现的人类遗迹而言，巴渝地区有最早的遗迹。可以说，巴渝地区古人类的遗迹是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遗迹相始终的。而史前期人类的活动，巴渝地区又有着对长江中上游文明影响巨大的遗存。

（一）巴渝地区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活动遗迹

在一般教科书里，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在古猿与猿人之间，就我国的发掘资料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尚有100多万年的空白。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发现一段直立人左侧下颌骨，以及与直立

人化石伴生的各种哺乳动物^①。1986年又发现了一枚直立人的上恒门齿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十余种、几件人工痕迹的骨片等^②。

巫山直立人化石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经测定,巫山人化石的年代约为距今204万年,它不仅是重庆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全国最早的。巫山人遗址遗物的发现,揭开了重庆地区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序幕。其后,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就生活、生息、繁衍在这一地区。

1949年以来,重庆地区的石器遗存即开始陆续被发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后,为抢救这些地下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发掘工作中,发掘清理的旧石器遗存达四十余处。如奉节草堂、鱼复浦、三沱;丰都高家镇、烟墩堡、井水湾、冉家路口;忠县唐家河;巫山江东嘴、上安坪、中安坪、下安坪等。

奉节县草堂遗址共发现有人类右肱骨化石及石器等。丰都烟墩堡遗址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主要出土物是大量特色鲜明的打制石器,这一类型的石器在我国南方是首次发现。

在渝西地区,也有大量旧石器遗址被发现、发掘。20世纪70年代,铜梁县西郭水库工地出土了三百多件打制石器,器物类型有刮削器(114件)、尖状器(33件)、砍砸器(73件),此外尚有石核、石锤、石片等。从石器类型可以看出,以割剥兽皮、兽肉的刮削器占绝大多数,说明当时的人们是以渔猎经济为主,辅之以采集。遗址中同时发掘出来的还有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化石有水牛、□牛、黑鹿、鹿、羊、巨獭、中国犀。这

① 黄万波、方其仁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3。

② 黄万波、方其仁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些哺乳动物化石中,绝大多数就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捕猎的对象。铜梁旧石器文化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23550 ± 450 或 27450 ± 350 年。说明它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又在巴县广阳公社新房大队采集砍砸器一件、刮削器两件;在江津莲花石采集砍砸器多件、尖状器一件。由于均为采集得来,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同一时期,大渡口区马王场十八冶金建筑公司采石场发现石器30余件,这些石器中,有盘状砍砸器、砢状砍砸器、单刃砍砸器、复刃砍砸器等,还有多种类型的刮削器和少量尖状器,这批器物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两万年左右。

综合重庆各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器物发现的情况,我们知道,在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重庆地区繁衍生息。

(二)新石器文化与农业文明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几乎遍及重庆的每一个地方。迄今为止,已在重庆市境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上百处,其中以未来的三峡库区最多,最为典型。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文化时期。中国境内现在所知最早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都是在这个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以黄河流域为例,前述新石器文化为早期,仰韶文化为中期,龙山文化为晚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按这个发展系列亦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主要遗存有:

早期遗存:

巫溪龙溪镇刘家坝遗存是1992年三峡库区文物规划调查队

发现的。刘家坝遗址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虽然遗址绝大部分被大水冲毁和扰乱，但考古工作者仍然在这里发掘出大量的陶器并发现有同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根据碳十四测定的结果，刘家坝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重庆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刘家坝遗存目前尚不能确定其是否有其他相同遗存在重庆的其他地区存在。但它位于三峡中的巫山县境内，而紧邻巫山县的湖北境内同一时期的城背溪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枝城市城背溪而得名）即与刘家坝遗存有很近的地缘关系，在年代上也非常接近，并且在陶器的制作方法上亦采用了同样的泥片贴塑法。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二者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湖北境内三峡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在巴东县、秭归县境内都有发现。相信其与刘家坝遗存之间的联系最终会找到。

奉节老官庙遗址亦是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的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的数据为距今 7875 ± 150 年，即公元5800年左右。

中期遗存：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最著名的就是与湖北接壤的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巫山县大溪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鄂西为主，巫山县是该文化分布的西端。该文化的发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在三峡地区，70年代以来，在江汉平原、洞庭湖以北地区亦有重要发现。大溪文化的时间约为距今6400年至5300年左右（即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

晚期遗存：

在三峡地面以西，近年发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相当多。

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调查发现了忠县□井沟遗址群和巫

山大昌坝遗址^①。

90年代以来,又发现了忠县哨棚嘴遗址(与□井沟遗址群属同一类型)、中坝遗址、江津王爷庙遗址、巫山魏家梁子遗址等典型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

以上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在重庆地区分布的地域非常广阔,它们东起巫山,西至忠县、丰都,北与四川巴中月亮岩、通江擂寨、广元张家坡、绵阳边堆山等遗址都有文化上的联系^②。足见分布之广,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之间,重庆地区,尤其是重庆的东部地区已经有了较多的人类活动遗址,这反映出先民们对重庆地区的开发从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较为广泛。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重庆地区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各考古遗址中看出来。但总的来说,新石器时代人类最大的进步一方面逐渐放弃了旧石器时代的渔猎和采集而逐步过渡到定居的农业,一方面是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形成了以血缘维系社会生活的氏族组织。

(一) 农业

原始农业的特征是锄耕农业,即以磨制的石铤、石斧、石锄开垦土地。老官庙下层文化的石器发现并不多,但以石斧、石铤为主。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重庆地区的原始人类就已开始用石铤、石斧披荆斩棘,开垦荒地,进入定居农业时代。老官庙下层文化的遗址由于在云阳、忠县、丰都等地都有发现,故可以断定,重庆地区的东部是重庆历史上最早进入农耕的地区。

①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② 江章华、王毅《川东长江沿岸史前文化初论》《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

大溪文化虽西边仅到重庆的巫山县境，但结合比大溪文化更早的巫山刘家坝遗址来看，可以这样说，巫山境内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中都留下了原始人类生活的遗迹。大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两侧磨刃的圭型石凿、斜双肩石斧、穿孔石铲、巨型石斧、石锄等。石器类型的增多和刃部的更加锋利，说明比老官庙下层文化年代晚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较老官庙下层文化有更高的农业水平。大溪文化的陶器中，有在淘泥中拌稻壳的现象，这又说明大溪文化时期农业种植的作物品种主要是水稻。

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先民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物种类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但是除水稻外应该还有其他粮食作物和菜蔬，这是没有疑义的。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定能找到这些证据。

（圆）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中，最伟大的是陶器的发明。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出现，既反映了其手工业的发展程度，又可以看出其与农业的关系。

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的奉节老官庙下层文化中，陶器从原料上看，主要有类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其制作手段简单，基本上都是手制，或用泥条盘筑，或在盘筑的陶坯上粘贴泥片。早期陶器的烧制温度并不太高，一般应在900℃左右。

早期陶器的种类有陶罐、陶缸、陶壶、盆、钵及碗、豆、器盖等。为使陶器美观，人们在陶器的表面施以纹饰，其中以绳纹为主，其余还有网格纹、人字纹、斜线三角纹和附加堆纹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陶器的种类明显增多，除罐、壶、盆、钵、豆外，还有□、盘、瓶、杯、器座等。器身以红色为主。在大溪文化的陶器中，炊煮、饮食器的种类与数量都大为增加，加之制作时在陶泥中掺入稻壳，故学者们认为大溪文化是“稻作经

济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①。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忠县□井沟遗址群以哨棚嘴最为典型，此外，同类型文化尚有奉节老官庙晚期、巫山魏家梁子等，其陶器主要为罐、盆、钵、高、□等，这些器物中，高、□是典型的农业为主的原始群落的器物，说明这些遗址的人们过着农耕的生活。这一时期重庆地区考古文化的器物，在制作方法上也有了轮制，但应用并不普遍，不少器物仍然是手工制作的，纹饰以绳纹、方格纹为主，也有附加堆纹、戳点纹、划线纹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由于烘制温度的提高，黑陶、灰陶增多。

在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中，重庆地区早期的人类除农业外，畜牧业和捕鱼、采集也是其重要的经济生活补充手段。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论述。

獠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族属

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东部最为密集，其中又以巫山、奉节、万县、忠县、丰都一带最为集中，这些地区考古文化的揭露，一方面是因为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重庆地区早期人类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这一带。从前面所提到的各考古文化类型和遗址的年代来看，巫山县内广泛存在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期的文化遗址。奉节县的老官庙遗址各期时代不同，但年代大致与巫山新石器文化的中晚期相当。三峡以西的忠县、丰都则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在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最典型的是大溪文化，而大溪文化又叠压在后来的巴文化之下，于是有人称其为“先巴文化”。而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分布区域（重庆地区）及与后来巴人的分布区域相当（前面已提到哨棚嘴遗址的文化特征与老官庙以

^① 袁东山《三峡地区汉以前古文化的发现与思考》，《三峡文化研究》第二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及四川境内嘉陵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文化内涵亦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说,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忠县□井沟遗址群为代表的考古文化,就是巴文化。是巴人在进入阶级社会前的活动遗迹。

(李世平)

二 巴人的历史与传说

重 庆自古以来简称巴，以其曾是巴人活动的中心。巴亦是最早见于文献的重庆居民。要了解重庆早期的历史，必须了解巴人的历史。

(一) 关于巴人的传说

关于巴人的传说，最早的当是《山海经》了。

《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这里所说，巴人为太皞苗裔，太皞为传说时代东方部落的首领。宋人罗泌《路史·后记》卷一则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这里巴人又源自伏羲。关于太皞和伏羲，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为一人，董其

董其祥先生认为“太皞就是太皞，伏羲就是伏羲”^①，即太皞、伏羲为二人。结合古代传说来看，仅《史记·补三皇本纪》称太皞庖牺氏，庖牺氏即伏羲氏。其他文献多单称伏羲氏（或庖牺氏）。因此，董其祥先生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海内经》的记载，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巴人先世的世系：
伏羲——咸鸟——乘厘——后照（巴人始祖）。

就巴人先祖世系而言，均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亦即传说时代。当中华大地进入阶级社会之时，主要居住在今重庆境内的巴人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今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这里是说夏启的臣子孟涂在巴这个地方主持祭神仪式，而巴人亦让他而主持狱讼，并且由此得到好评。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孟涂是巴人中主管祭祀的，并因之而主管狱讼，而专职的祭司和专职主管狱讼都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海内南经》所反映的巴人狱讼，也反映出这时的巴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和中原地区是大致相当的。

其二，孟涂住在丹山上，而丹山在丹阳之南。这里的丹阳，郭璞注为：“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也就是说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境内。《水经注·江水》条亦说：“江水又东迳城北，……其城北对丹阳城。”这里的城北，是指秭归城北。但罗泌《路史·后记》十三则说：“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地。丹山仍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亦称：‘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两说

① 董其祥《巴史新考·山海经记载的巴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